

钱熙泰、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*

——以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为中心

谢 辉

内容摘要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为钱熙泰所撰杭州行纪,详细记载了道光年间钱氏与张文虎三次至文澜阁访书的情况,并保存了历次抄书校书的目录。将该书与张氏所撰杭州行纪合而观之,可知第一次到杭州时,钱、张等人在文澜阁司事周献的帮助下,借出117种阁本,抄录其中63种,又自备底本取校阁本81种。第二次仍托周献抄录阁本65种,第三次托新任司事朱石樵抄书数十种。总计抄书至少128种,其中有56种后被收入《守山阁丛书》等钱氏家族编刻的各种丛书中,成为重要的底本来源,保存了部分文澜阁本的面貌。所校之书中有69种被收入各种丛书。实践证明,阁本发挥的校勘作用有限,这也促使钱氏不再迷信阁本,而着力搜求其他版本进行他校,特别是对《墨海金壶》等丛书的利用。

关键词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 张文虎 钱熙泰 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
《守山阁丛书》

作为晚清上海地区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,金山钱氏的刻书事业持续了至少五代人之久。今传《金山钱氏家刻书目》,列出钱氏家族成员自撰与校订辑刻的27种书(含丛书)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无疑是钱熙祚辑《守山阁丛书》《珠丛别录》《指海》与钱熙辅辑《艺海珠尘》壬、癸二集。而这四部规模较大的丛书,均与钱熙泰、张文虎的文澜阁访书有密切关系。

清道光十五(1835)、十九、二十年,钱熙泰(1810—1858,字子和,号

*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“梵蒂冈图书馆藏中国传统古籍善本整理与研究”(21YJA770013)阶段性成果。

鲈香,金山人)和张文虎(1808—1885,字孟彪,一字嘯山,号天目山樵,南汇人)曾三次到访杭州文澜阁,并撰写了详尽的访书记。其中张氏所撰四种笔记(《湖楼校书记》《余记》《西泠续记》《莲龕寻梦记》)于其身后的光绪十五年(1889)刊行,学界久已知之。而钱氏所撰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(以下简称“《笔记》”),则知者较少。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钱氏这一著作的价值,如王晓雪即利用该书对张文虎的生平作了不少订补^①。但钱氏此书最值得注意之处,在于保存了大量不见于张书的文澜阁抄书校书细节与书目。此前对文澜阁进行研究的成果,如民国间张崑《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》(《文澜学报》1935年第1期)等曾有零星引用,但全面系统的论述似尚未见。本文即以钱氏《笔记》为中心,将其与张文虎所撰诸书参互考订,力图还原三次访书活动的全貌,以助探讨金山钱氏家族刻书的有关情况。

一、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概述

《笔记》为钱熙泰所撰杭州行纪,长期未经刊行。民国二十年(1931),金山人白蕉(1907—1969,原名何旭如)从钱氏后裔钱灿若处得到这份遗稿,述其事曰:“先生曾孙钱灿若先生为余卯角交,十年读书嬉戏,时相过从。近出先生手写稿,则赫然遗著五种也!”^②是时白蕉方供职于人文图书馆,因念此稿“无闻者几近百年”,且“颇关我国文献”,遂以居家侍疾之暇,费时月余抄校一遍,以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为总名,在《人文月刊》上陆续刊载,共十四期连载完毕。具体的刊期与子目为:

《西泠校书记》,1931年第2卷第7期,1932年第3卷第6—7期;

《余记》,1932年第3卷第8期;

《文澜阁校书目录》《文澜阁抄书目录》,1932年第3卷第10期;

《武林续游记》,1933年第4卷第2—4期;

《文澜阁抄书目录》《续抄书目》,1933年第4卷第5期;

《张文虎游杭诗钞》(原无标题,据内容拟),1933年第4卷第5—7期;

《莲龕寻梦记》,1933年第4卷第7—8期。

^①王晓雪:《张文虎年谱》,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王永吉指导),2020年,第20—25、28—32页。

^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1年第2卷第7期,第2页。

按照白蕉的说法,钱氏此稿共计五种,但实际仅有四种,即记载第一次到杭州的《西泠校书记》与《余记》,第二次到杭之《武林续游记》及第三次到杭之《莲龛寻梦记》。其余的抄书、校书目录和张文虎诗作,都属附录性质。此外,钱灿若提供的钱熙泰遗稿中,可能还有其他内容。如《人文月刊》1931年第2卷第3期曾登载无名氏《杂记》一种(第1—14页),谓底本为旧抄本,出松江人手笔,记清初顺治时京内事甚悉,也是钱灿若所赠。又《人文月刊》1934年第5卷第4期刊有钱熙泰《吴门游记》一种(第1—7页),记钱氏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)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初七日游苏州之事,猜测亦应与杭州游记同出自钱氏遗稿。

白蕉得到的钱熙泰遗稿,保存情况不太好,其在《笔记》之末的跋文中已提到:“原稿系先生手书,蠹蚀破烂,字有剥脱或仅存其半及一二笔者。”^①白蕉依据钱氏《古松楼剩稿》与张文虎《舒艺室集》,作了不少校补工作,但可能仍有改而未尽之处。此外还有很多错误,明显是在排印环节产生,如全稿之末的白蕉跋文,“文澜阁钞书目录”之“澜”误作“欄”。由此而言,经白蕉整理的《笔记》,实际问题颇多,但其所据底本的真实性,则不容怀疑。《笔记》之首,有道光二十二年“倚戟生兄伟”和二十五年张焯、张振翻题诗,以及道光二十三年马承昭观款。末有道光二十八年沈儁曦、二十九年张国梁,以及未署时间的张家鼐题诗。这些题咏皆明言因观钱稿而作,如张振翻即言“奉读鲈香五兄先生《西泠〔冷〕记游》一集,拜服之至”^②,且很多人都与钱氏及张文虎有密切交往。如张焯、张振翻、张家鼐都属南塘张氏家族,张文虎曾为该家族诗集《南塘张氏诗略》作序^③,张家鼐又称钱熙泰为“姻丈”,沈儁曦在张文虎诗中亦被提及^④。原稿既有这些题识,说明其即便不是所谓钱氏手书,至少也应是一个誊清的稿本。

《笔记》中还附载了钱熙泰和张文虎的很多诗作,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见于二人刊行的诗文中。两相比较之下,张诗出入不大,而钱诗很多都有明显差异。如《西泠校书记》载钱诗《冷泉亭》第一首为:“万山斜抱一

^①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8期,第11页。

^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1年第2卷第7期,第2页。

^③徐雁平编著:《清代家集叙录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7年,第841—843页。

^④张文虎:《怀人十五首》,《舒艺室诗存》卷五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497页。

亭小,面面曲栏延碧篠。阴崖衔日昼冥冥,无数白云开洞晓。”^①而《古松楼剩稿》作:“众山团团一亭小,泉流无声只啼鸟。阴崖衔日昼冥冥,万壑松杉夹丛篠。”^②仅有一句完全相同。这应是钱氏刊刻其诗集时,请张文虎对其诗进行了修订(详见下文),由此也能看出《笔记》所据之稿的原始性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和《中国古籍总目》均著录《西泠纪游稿》稿本藏上海市金山区图书馆,猜测即是《笔记》的底本。但经与金山区图书馆联系得知,由于历史原因,此稿本现已不在该馆。故《笔记》尽管有大量讹文误字,仍是目前唯一可据且可信之本。

《笔记》中《西泠校书记》《武林续游记》《莲龛寻梦记》卷首均有钱熙泰识语,《武林续游记》识语明确题“己亥秋八月熙泰识”^③,即钱氏第二次到杭州的道光十九年。可见这些行纪的初稿,都应写于钱氏三次旅杭期间。值得注意的是,将《笔记》与张文虎杭州行纪加以对比,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雷同现象。一方面,二人所撰的行纪皆为四种,且书名都极为类似,第四种《莲龛寻梦记》甚至同名。其一、三、四均为按日记载三次游杭的情况,区别仅在于,第一次杭州之行,钱氏返程较早,故其所撰《西泠校书记》止于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,而张文虎《湖楼校书记》止于同月二十七日。第二种《余记》,二家所撰者皆为记载第一次到杭州时所见西湖之景致、杭人之风俗,以及抄书、校书的情况。另一方面,二人的文字表述也有不少相同之处。如张文虎《西泠续记》载道光十九年八月十日游吴山,登第一峰远眺,有“万家闾闾,如纹在掌,江波不动,环带其外”^④的描述,钱熙泰《武林续游记》仅易“动”为“兴”。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用偶尔暗合来解释。白蕉说:“钱鲈香先生诗,刻有《古松楼剩稿》一册,版早毁。其浙游诗与日记,前为余校刊于《人文》。诗多经张嘯山先生改易。原稿现藏余处。鲈香先生应酬之作,嘯山先生时为代笔,书籍中时见零星纸稿,故知之。”^⑤可见《笔记》中所收钱熙泰诗作与《古松楼剩稿》颇有不同,是张文虎修订的结果。此行纪虽然并非应酬之作,钱氏大约也未想刊

①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6期,第3页。

②钱熙泰:《古松楼剩稿》,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元年(1875)刻本(索书号:81636),叶九。

③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2期,第1页。

④张文虎:《西泠续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13页。

⑤白蕉:《四山一研斋随笔》,《白蕉文集》,东方出版中心,2018年,第215页。

行,但写成初稿后仍有可能参考张氏之作加以润饰^①。前引《笔记》所载诸家题咏,最早者为道光二十二年,钱氏行纪的定稿,大约写定在此时。

钱熙泰尽管可能借鉴过张文虎的行纪,却并非全盘抄袭,二人之书巾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。这些差异有的是因为二人行程不同,如钱氏《莲龕寻梦记》载其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九日午后,进钱塘门访周献,又到吴山观剧,及游净慈寺、净业庵等^②;张文虎则因肺疾未出,只记“鲈香挈仆入城,薄暮而回”^③。也有的是二人行程一致,而纪事侧重不同。如张文虎《西泠续记》记载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到汪氏借闲小筑拜会胡培翠和陈奂,重点叙述了二人的著作和学术^④,钱熙泰《武林续游记》对此并未多着笔墨,但记录下其从汪家“借《数学九章》全帙。以补阁本之佚”^⑤之事,张文虎又未言之。此外,还有些差异是彼此矛盾的,二者当有一误。如张文虎《莲龕寻梦记》载道光二十年九月十日,弥勒院僧道生自焦山归,言焦山、金山崩坼事,而钱熙泰系于十一日;张文虎于十一日载“鲈香入城访朱石樵不晤”,而钱熙泰系于十日^⑥。总体而言,二人的记载大都还是能够彼此印证、相互补充的,合而观之,足以勾勒出这三次杭州访书的情形。

二、钱熙泰与张文虎三次文澜阁访书的情况

钱熙泰与张文虎的三次杭州之行,虽然皆以访书为目的,但具体的行程却不尽相同。总的来看,第一次来杭时以到文澜阁抄书校书为主,工作较为繁忙,甚至连西湖景色都无暇领略,正如张文虎在《孤麓校书图记》中所说“群日夜读书一楼,若未始知有西湖者”^⑦。其抄书校书的细节,张

①有研究指出:“由于记录者之间的特殊关系,或为血缘,或为师徒,在特定时间及空间条件下,日记私密性特征较为薄弱,由此存在相互交流、借阅、抄录甚至代笔的可能性。”(贾宏涛:《翁心存、翁同龢居京日记对读研究》,《文献》2021年第5期,第32页)张、钱二人杭州游记内容雷同,应亦缘于此。

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7期,第7页。

③张文虎:《莲龕寻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23页。

④张文虎:《西泠续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15页。

⑤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2期,第8页。

⑥张文虎:《莲龕寻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23页。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7期,第7页。

⑦张文虎:《孤麓校书图记》,《舒艺室杂著》乙编卷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386页。

文虎《湖楼校书记》与《余记》已经记载了不少,钱熙泰《西泠校书记》与《余记》又有很多补充,今合二家之作而述之。

道光十五年十月四日,钱、张等一行五人从秦山(今上海市金山区境内)登船出发,同行者还有钱熙泰之兄钱熙祚(雪枝)、顾观光(尚之)和李长龄(兰垞),七日到杭州。其时钱熙泰之族兄钱熙咸(即山)恰好在杭州参加乡试并得中,九日遂定寓于钱熙咸住所附近之“湖楼”。其具体地点,张文虎已经明言“在白堤之东,大闸口南数步。旧为文昌宫,供奉文星,后卖为民房。上下八间,面湖背街”^①。所谓“大闸口”当为钱塘门外西湖东北岸的“石函三闸”一带。钱氏记其名为“文昌阁”,谓“楼房八楹,启窗凭眺,湖山皆在樽俎间”^②,亦与之合。

住所确定之后,钱、张等人于十月十四日首次到访文澜阁,当天即借出一些阁本,故钱氏本日记事,有“是夕同人以阁本分校”^③之语,校书工作从此开始。十五日,“仁和孙诒堂”也来襄理校书^④。但此次领出之书数量可能较少,因此至十八日,钱、张二人只校了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(此书四十卷,张氏校三十二卷,钱氏校三卷,其余可能为他人所校)、《文子》和《纬略》三种,钱氏又抄《邓析子》及《读书杂志》,后者乃从灵隐书藏借来。十九日,钱氏等又到文澜阁借书。张氏仅语焉不详地记载“偕同人至文澜阁”^⑤,但钱氏则明言“偕周竹所、程秋湖、孙貽堂至文澜阁,携书百数十种出”^⑥,可见此次借出阁本的数量远远多于上一次,这应与钱氏提到的“周竹所”有密切关系。此人在钱、张二人的三次杭州行纪中,都被反复言及,但张氏只称其为“竹所”,而钱氏则记其名为“周献”,为文澜阁司事^⑦。文澜阁书原本管理颇严,阁门钥匙二套,“一在盐运司衙门,一为总局收管,重门封锁,出入綦难”^⑧。但至道光年间,已渐趋废弛,阁书且有丢失的情况,仅钱氏目验者,即有《数学九章》内失一本,《说文系传考

①张文虎:《余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08页。

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1年第2卷第7期,第7页。

③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1年第2卷第7期,第13页。

④张文虎:《湖楼校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05页。“仁和孙诒堂”生平不详,仅参与第一次访书。钱氏《西泠校书记》作“貽堂”,自道光十五年十月八日起出现对此人的记载。

⑤张文虎:《湖楼校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05页。

⑥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6期,第4页。

⑦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7期,第7页。

⑧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8期,第4页。

异》内失下卷首页,尚未登记造册^①。而管理文澜阁的实际权力,大约即在周献手中。正是因其之通融,钱氏一行才能够大批借书,而后抄书校书的效率开始显著提高。二十二日,开始雇佣抄书工人抄录阁本^②。二十五日,周献与孙远迁居湖楼,司收发书籍^③。有了抄工和管理书籍的专人,钱、张等人遂可以专心校书。其后钱氏于十月三十日又到文澜阁,借书十四册^④。十一月初五至初六日,钱、张与李长龄等,到西湖西南的三天竺、郎当岭、五云山一带,作二日之游,并在云栖寺留宿一夜,钱氏谓“屈指至杭已匝月,惟此行稍畅游兴”^⑤。其余的时间,基本都在校书。至十一月十日,钱熙泰先乘船返乡,十四日抵达,张文虎则留在杭州继续工作。十一月十九日,抄书事竣。二十日,抄录的阁本全部覆校完毕。二十一日,张文虎用阁本《类说》校《续世说》。二十二日缴清阁本,二十四日登舟返回,二十七日抵乡^⑥。首次文澜阁访书,至此即告一段落。

钱、张二人所撰《余记》,皆谓参与校书者五人,尚有顾观光、钱熙咸、孙诒堂。但钱熙咸于十月二十六日即同钱熙祚先行返乡,十一月一日,孙诒堂亦去苏州,十五日方回^⑦,其参与的工作较少,校书最多者,除顾观光

①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8期,第4页。

②按,此据钱熙泰《西泠校书记》(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6期,第4页)。钱氏《余记》谓抄书“始十月二十日,止十一月十九日”(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8期,第6页),似略有不合。

③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6期,第4页。按,有关文澜阁管理的具体制度和人员,张崑《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》已有“文献凋零,难堪尽考”之叹,今亦未能考得其详情(《文澜学报》1935年第1期,第29页)。但据潘猛补所考,道光十九年冬之前,文澜阁由两浙江南都转盐运使司管理,具体负责日常事务者为典守和司事。典守掌图书保管、检曝及出纳,司事掌文牍、会计、庶务及应接外客,一般以举人或贡生出身的教官充之。借阅阁书者,一般每次五册,限半月归还,但也有多借或展限之例。如首任典守仇养正卒后,其外甥范元伟继任,即开阁书大量外借之先例(详参潘猛补:《古代官方藏书流通之先河:文澜阁借阅史实考》,《图书馆研究与工作》1996年第1期,第58—59页)。其说未注明出处,但应有所据。故周献大批外借阁书,乃是有先例之举。且司事未必需要每日到阁办公,故周献可以迁居湖楼,更加方便对外借阁书之管理。

④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6期,第5页。

⑤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7期,第5页。

⑥张文虎:《湖楼校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07—608页。

⑦张文虎:《湖楼校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05、607页。

外仍当属钱熙泰、张文虎二人。另有专司绘图之李长龄,负责计字之周宪廷^①。抄工在寓者三十余人,在外者十余人。据钱氏记载,抄书价格为每千字 34 文^②,共抄 320 万余字^③,则仅抄工费用一项即在十万文以上,花费颇为不菲。

道光十九年八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七日、道光二十年九月四日至十月十二日,钱熙泰、张文虎又有两次杭州之行,皆寓于宝石山弥勒院之十三间楼。这两次行程,张文虎《十三间楼校书图记》中也称为“续文澜阁校书之役”^④,但张氏的《西泠续记》与《莲龕寻梦记》却很少有相关记载。《西泠续记》载张氏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、十六日,两次到文澜阁,但只言在此处见到了胡培翬,相与讨论学术,有“意气甚相得”之感^⑤,并未提及文澜阁书。此外大部分的内容,都是讲钱、张二人在杭州游玩的情况。其中九月三日前,多在杭州城和西湖一带游览。九月四日至十三日,又远游西天目、九锁山一带。返回杭州后,张氏于十五日感觉“苦雨连绵,资斧且竭”^⑥,已有归意,十七日起才开始有校书的记录,但又未明言书从何而来。在《莲龕寻梦记》中,张氏陈述及在西湖周边游历的情况外,还用很多笔墨讲到绍兴游禹穴、兰亭等处的经过,全无校书记载。偶言抄书,也并非借自文澜阁。如其于道光二十年十月三至五日,从徐橡(问蘧)借抄徐有壬《务民义斋算学》四种中的三种^⑦,后来由钱国宝于同治八年(1869)以活字印行^⑧。如果仅据张氏所记,则似乎这后两次杭州之行,与文澜阁并无太大关联。而钱熙泰所著《武林续游记》和《莲龕寻梦记》则保存了一些很关键的信息。

据钱氏记载,道光十九年第二次到杭时,钱氏于八月十二日进钱塘

①按,此人在张文虎《湖楼校书记》中被称为“周翁”,休宁人,与钱熙咸在杭州时同寓(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603 页)。

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 年第 3 卷第 10 期,第 7 页。

③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 年第 3 卷第 8 期,第 6 页。

④张文虎:《十三间楼校书图记》,《舒艺室杂著》乙编卷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387 页。

⑤张文虎:《西泠续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615 页。

⑥张文虎:《西泠续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621 页。

⑦张文虎:《莲龕寻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627 页。

⑧钱国宝:《务民义斋算学三书序》,钱培荪汇录:《金山钱氏家刻书目》卷十,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四年(1878)刻本(索书号:目 58 895),叶三十四至三十五。

门,经按察司署而东,过岳庙,“访周竹所托抄文澜阁书数十种”^①。钱氏《武林续游记》末所附《文澜阁抄书目录》《续抄书目》,大约就是此次托周献所抄。道光二十年第三次到杭时,钱氏于九月九日拜访周献,得知其已于去年冬天被撤去文澜阁司事之职,由时任两浙盐运使的岳镇南委官查修,另设训导一员,总管锁钥,以章黼^②充之。而“司一切晒书事务者,为朱石樵茂才。是以阁中出入,较严于畴昔”^③。当时朱氏居住在佑圣观巷,馆于大学士章煦之婿金韞山(其人未详)家。与之同馆者冯尚谦(腴生),钱、张第二次来杭时,即已结识其人及其父冯焯(醒香)^④。此次来杭,冯焯已先至,亦寓弥勒院,冯尚谦时来探望,钱氏正是通过冯尚谦的关系“付石樵文澜阁需写书目数十种”^⑤。此后钱、张二人与朱氏有一些往来,但未再提及抄书事,也无抄书目录留存。

三、文澜阁访书与金山钱氏编刻丛书的关系

钱熙泰和张文虎的三次文澜阁访书,与钱熙祚编刻的《守山阁丛书》有直接关联。据张氏记载,道光十三年其馆于钱家,参与《守山阁丛书》的编纂。钱熙祚拘于《墨海金壶》之例,书前必欲冠以《四库提要》。张氏以为“嘉道以来,书之未登于《四库》者,先后继出,不必限此。且既限此

①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2期,第4页。此“岳庙”指始建于南宋的忠佑庙,亦称岳王家庙,旧址在原浙江省高等法院(今庆春路与延安路交叉口北)一带,非今西湖北岸北山街之岳王庙(详参倪士毅:《杭州岳飞遗迹考》,《史地论稿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9年,第336页)。钱氏谓访周献后,出而东行,至众安桥。可见周献当时即住在此二地之间,今庆春路上不到一公里的范围内。

②按,章黼字次白,仁和人,嘉庆十五年(1810)优贡,官松阳教谕,卒于咸丰七年(1857),生平见潘衍桐编纂,夏勇、熊湘整理:《两浙轺轩续录》卷二六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1828页。所著《梅竹山房诗钞》及《词钞》,南京图书馆有藏,王国平主编《西溪文献集成》(第6册,杭州出版社,2017年)收有节录本。章氏曾董理西湖疏浚事,故钱氏称其为“后湖董事”,还曾于九月十三日到孤山苏公祠旁之浚湖局参观。

③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7期,第7页。

④张文虎载道光十九年九月二日“塘西冯腴生尚谦来会”(《西泠续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18页),钱熙泰《武林续游记》亦记是日冯尚谦和陈奂来,又载九月一日“塘西冯醒香来院”(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3期,第7—8页)。

⑤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7期,第7页。

例,则宜求《四库》所收之本,是必请钞于文澜阁而后可”^①。其余所议亦多有异同,三年始决,方有道光十五年第一次杭州之行。但张氏的行纪中,只记载了首次到杭时从文澜阁所抄之书及其个人所校之书的情况,并不全面。结合钱熙泰的记载,则可以更为明确地看出文澜阁访书与钱氏家族编刻丛书的关系。

钱、张二人的三次访书活动中,以第一次的规模最大,包括抄书与校书两个部分。抄书方面,张文虎在《余记》中列出 63 种书的清单,而钱氏《余记》后所附《文澜阁抄书目录》则更加详尽,共计 116 种书,还包括有借出而未抄的部分。钱氏在此目录后附注云:“内自抄三种,以○别之;不抄计五十种,以△别之;雇抄胥手共抄六十一一种。”^②此三项合计与总数 116 种不符,且通过与张氏目录进行核对,可以看出,钱氏的记载也有一些错误,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:

第一,张目所载雇抄工所抄之书 61 种,钱氏误将《坤舆图说》一种标注为未抄,又漏江永《仪礼释例》一种。

第二,张目另列“别抄”二种,即《邓析子》与《新仪像法要》,应即是钱目所称“自抄”,并在目录中将此二种书以“○”符标出。可见钱目附注中所谓“自抄三种”之“三”应为“二”之误。

第三,钱目中《史记疑问》《蒙古源流》《朝鲜史略》《禹贡论》四书,未加“△”符,但也不见于张目,应皆未抄。钱、张都提到《禹贡论》通志堂本无图,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据《永乐大典》补图二十八幅^③。但借观文澜阁本,发现仍然无图。其主要打算增补的就是图的部分,既然文澜阁本无之,当然也没有抄录的必要。

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,此次抄书过程中,雇工所抄者 61 种,钱氏自抄者 2 种,借而未抄者 54 种,合计 117 种。阁本请工人抄录完毕后,钱氏与张氏等还要覆校一遍。经初步统计,钱熙泰共校《尚书注考》等 19 种,张文虎校《诗疑辨证》等 24 种。所抄的 63 种书中,有《三家诗拾遗》等 24 种收入《守山阁丛书》(钱目一般标以“刊”字),《仪礼释宫增注》等十种

①张文虎:《怀旧杂记》卷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662 页。

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 年第 3 卷第 10 期,第 7 页。

③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 年第 3 卷第 8 期,第 5 页。张文虎:《余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30 册,第 609 页。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91 页。

收入《指海》(钱目一般标为“刊小”),《左氏释》等二种收入《艺海珠尘》增补本。这些被收入钱氏家族所辑刻的各种丛书的品种,其底本有不少是文澜阁本。如《守山阁丛书》所收《近事会元》,末附钱熙祚《近事会元校勘记》,即谓该书是“从文澜阁本抄出校梓”^①,后得旧抄本,校勘一过,别作校记。凡《守山阁丛书》中以文澜阁本为底本者,其卷端一般会题“四库全书原本”,《近事会元》即如此。但也有例外,如江永《算学》八卷续一卷,《守山阁》本题“数学”,卷端也题“四库全书原本”。但卷末钱熙祚跋文谓“原本转写错乱,第五六卷七政诸图尤甚,为详审订正,付之梓”,时题“岁在鹑火景长日”,即道光十四年,在第一次文澜阁访书之前。如果本年该书已校订完毕,则所用的底本就未必是文澜阁本。

除了抄录并覆校文澜阁本外,钱熙泰一行第一次到杭州时还有另一项工作,即自备底本,取阁本校勘。钱熙泰列有《文澜阁校书目录》^②,著录了79种书籍,其中有18种为张文虎校,19种为钱熙泰校,还有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一种为二人共校。所校之书中,有《易象钩解》等47种收入《守山阁丛书》,《昆仑河源考》等4种收入《指海》,《征南录》等2种收入《艺海珠尘》增补本,《中吴纪闻》等14种收入《珠丛别录》。此外张文虎还记载其曾校《奇器图说》(附《诸器图说》)与《续世说》^③,未见于钱氏目录,这两种书后来也被收入了《守山阁丛书》。

通过对比可得知,钱氏校书目录所载的79种书中,有63种又见于张海鹏辑《墨海金壶》(以下简称“《墨海》”)^④。钱熙祚辑《守山阁丛书》,受《墨海》影响很大,其在全书前《总目》后的识语中即明言:“曩阅昭文张若云氏海鹏《墨海金壶》,稟依《四库》,体例整齐,颇多秘帙。刊行无何,遽毁于火。然所采既驳,校讎未精,窃尝纠其鲁鱼,几于累牍,脱文错简,不可枚举,遂拟刊订,重为更张。”由此推断,这63种书中,有相当一部分应

^①钱熙祚辑:《守山阁丛书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刻本(索书号:7940)。下文凡描述《守山阁丛书》所收各种著作情况时均简称为“《守山阁》本”,为避免重复,仅随文注明出处。

^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10期,第1—3页。

^③张文虎:《湖楼校书记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,第607页。钱氏《余记》谓“校书八十余种”(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8期,第6页),可见其所列者未必无遗漏。

^④张海鹏辑:《墨海金壶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刻本(索书号:A02857)。本文所用《墨海金壶》皆为此本,为避免重复,下文凡出自该丛书者,仅随文注明出处。

该就是以《墨海》本为底本,取校阁本。但也有用其他版本的情况,钱氏目录中已注明两种,即《太白阴经》以精抄本校,《汉武帝内传》以《道藏》本校。其余的16种书,还有3种曾被张海鹏辑《借月山房汇抄》收录。另有四种在钱氏目录中标明了底本,如《金漳兰谱》是用《说郛》本校。这些与阁本校过之本,后来刻印的情况各不相同,大致可分以下三类:

第一,主要用张海鹏所编丛书的旧板重印。如《张氏可书》,《守山阁》本从卷前四库提要到正文,全部是《墨海》旧板,只是剝去了其卷端“墨海金壶子部”与卷末“嘉庆十四年张海鹏校梓”字样,而于卷端改刻“守山阁丛书子部,金山钱熙祚锡之校”。但此种全部皆用旧板的情况相对较少,常见的情况是抽换正文首叶和第二叶。卷中也有补板和剝改的现象,如《守山阁》本《折狱龟鉴》《靖康细素杂记》《纬略》《余师录》,《珠丛别录》本《阵纪》等,都是如此。甚至有些品种,号称用阁本作底本,实则不然。如《守山阁》本《唐语林》,卷末有道光十九年钱熙祚校勘记,明言“既遵《四库》本付刊”,实际其中掺杂了大量《墨海》本旧板。这些品种之所以能用旧板重印,显然是因为用阁本未校出明显差异。如有采用其他版本或材料进行校勘者,则以在书后补刻校勘记的方法予以补正。

第二,新刻与旧板混合。此类情况中最典型者当属《太白阴经》。《守山阁》本卷末有道光二十年钱熙祚跋文,谓《墨海》本十卷,称从影宋本出。道光十二年,钱氏偶得旧抄本六卷,较《墨海》本为佳,惜缺后四卷。其将此书刊入《守山阁》时,“前六卷主旧抄本,七、八卷主文澜阁本,仍参合异同于下,惟九、十两卷则仍依张刻付梓”。今取二本对比之,可见《守山阁》本前八卷与《墨海》本差异很大,确为新刻,但仍有少量夹杂旧板处,如卷八末叶即明显用《墨海》旧板。九、十两卷,用旧板较多,而有增补挖改,如卷十叶一B面“推三十六禽法”下,《守山阁》本即在《墨海》旧板上补刻了“诸禽颇有讹缺”云云两行小字注文。

第三,基本全部新刻。此类情况又可分为二种:一是简单翻刻底本。如《守山阁》本《昭忠录》,全书皆为新刻,但其正文行款与《墨海》本全同,内容也出入不大,推测是以阁本校《墨海》本而未见差异,即直接用《墨海》本翻刻。类似的情况还有《守山阁》本《易说》,其卷末有钱熙祚跋文,完全未提到《墨海》,但从内容与行款来看,仍当是翻刻自《墨海》本。钱跋末题道光十二年,如果可靠,就说明早在第一次文澜阁校书之前,此书可能已翻刻完成,或至少做好了刊刻的准备。本次以阁本校《墨

海》本而未有所得,故不需要再做修订。此二书之所以未用旧板,大约是《墨海》板片损毁的缘故。二是新刻本的内容与底本有较大差异。如《守山阁》本《乐府杂录》,钱氏除阁本外,还用《太平御览》《类说》等材料作了他校,并在正文中用小字校记注明。其中言及“旧讹”“旧脱”者,多与《墨海》本合,应即以其为底本,但改易颇多,故未用旧板,而是全部新刻。又如《守山阁》本《大金吊伐录》,钱熙祚跋谓“张氏据超然堂吴氏本刊入《墨海》,仅分上下二卷。以文澜阁本校之”,发现脱漏极多,遂“遵阁本付梓,而吴本义可两通者,仍分注于下”^①。可见其先以《墨海》本为底本,校过阁本,见其不佳,刊刻时遂改用阁本,故全书皆为新刻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《守山阁》本《乐府杂录》卷前的四库提要,仍用《墨海》本旧板,与其情况相同的,还有《羯鼓录》等书。可见钱氏家族在编刻丛书时,即便是对于需要全部新刻之书,也尽量利用已有的板片。

总的来看,钱熙泰和张文虎的第一次文澜阁访书,抄书的收获较丰,而校书的成果不多。钱氏已明确指出,所校诸书中,“阁本唯《太白阴经》较家藏本增十之三,《大金吊伐录》校《墨海》本增十之五”,其余如《战国策校注》《珩璜新论》等“或增或减,亦多差谬”;《汉武帝内传》“较《道藏》本少十数条,盖亦从《广记》中摘出者”^②,故在收入《守山阁丛书》时,既未用阁本,也未用《墨海》与《说郛》《汉魏丛书》等本,而用内容较多的《道藏》本^③。经过此次实践后,钱、张大约感觉校书的意义不大,后两次文澜阁之行,遂放弃校书,而专意抄书。钱氏《武林续游记》后附《文澜阁抄书目录》,共著录 38 种书^④,其中《直隶河渠志》等 10 种为第一次借出未抄,钱、张二人仅校《春秋胡氏传辨疑》《汝南遗事》《象台首末》《讷溪

^①钱培荪汇录:《金山钱氏家刻书目》卷三,叶三。《守山阁》本《大金吊伐录》卷末钱熙祚跋文中“超然堂”三字作墨钉一枚,占两格。

^②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2年第3卷第8期,第6页。胡培翠《守山阁丛书序》也只举《太白阴经》《珩璜新论》《汉武帝内传》《大金吊伐录》四种论《墨海》本之不佳。

^③参见《守山阁》本《汉武帝内传》卷末钱熙祚《汉武帝内传校勘记》。文中谓“唯《道藏》本文多至倍”,似乎多出的条目数量不止十几条。该本虽然全部新刻,但卷前四库提要仍用《墨海》旧板,与上文所述《乐府杂录》等书同。

^④白蕉整理: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,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5期,第1—2页。

奏议》《六艺纲目》5种^①；《续抄书目》著录27种书，《玉山纪游》等7种为第一次借出未抄，钱、张二人没有对其进行覆校的记载。《抄书目录》中《象台首末》等18种书后来被收入《指海》；《续抄书目》中《书法雅言》收入《艺海珠尘》增补本；《春秋通义》收入《小万卷楼丛书》。

《守山阁丛书》子目112种，与访书活动直接相关者至少有73种；《珠丛别录》28种，相关者14种；《指海》140种，相关者32种；《艺海珠尘》壬、癸集42种，相关者5种。且此统计只据钱、张二人现存的杭州行纪中明确记载的抄校之书而言，实际与之相关者恐不止于此。如《意林》和《历代建元考》二书，虽无抄校的记录，但阁本曾在第一次访书时被钱氏借出。后来这两种书分别被收入《指海》和《守山阁丛书》。若从广义的角度而言，也可说其与访书活动有关。又如《晓庵新法》不见于历次抄书、校书目录，但《守山阁》本卷末有钱熙祚跋，明言道光十七年沈眉寿携该书旧抄诸本见示，乃参合校勘，更据文澜阁本正之，次年刊成。若其所述为实情，则该书的阁本可能也是在第一次访书时抄得。

四、结语

钱、张二人三次到访文澜阁，至少抄录了128种阁本，有56种后来被收入钱家辑刻的各种丛书中，其中相当一部分，如《尊孟辨》《京口耆旧传》《越史略》等，都是罕见传本，此前鲜有刻本行世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钱、张二氏的抄书之举在文澜阁被毁之前，其抄录并刻入丛书的品种，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阁本的原貌。如《指海》本《坤輿图说》，有研究者已经指出，其卷下《四海总说·海舶》之末“不待指山岛为准”云云一段文字，四库本等各种传本多无之^②。此书即是第一次访书时从文澜阁抄得者，故推测文澜阁本原与文渊阁等别阁之本有所不同，今传文澜阁本

^①其中《六艺纲目》为二人分校，其余皆张校。参见白蕉整理：《钱鲈香先生笔记》，《人文月刊》1933年第4卷第4期，第8页；张文虎：《西泠续记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0册，第621页。

^②邹振环：《世界想象：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》，中华书局，2022年，第155页。经核对，今存文渊、文澜、文溯三阁本，清康熙刻本（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）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（索书号：Chinois 1526）皆无此段文字；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有残缺，有关此段文字之叶脱去，但经目验，该本与上图及法图藏本同板，应亦无之。

为丁丙补抄,已经消弭了这一差异,而《指海》本大约源自文澜阁原本,保存了此处独特的异文。即便是那些抄而未刻之书,钱熙泰仅记其书名,也对研究文澜阁有一定价值。如《续抄书目》中有《国史考异》六卷,此书在《四库全书》中原编于史部史评类《史纠》之后,后被撤出,其中四部撤出本今存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,包括南三阁本与文津阁本^①,但钱熙泰既已抄录此书,可知文澜阁并未将其撤去。

与抄书相比,钱、张二人到文澜阁校书,可谓所获甚少。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《大金吊伐录》《太白阴经》等少数几种外,阁本大都没有重要的校勘价值。《守山阁》本《乐府杂录》《羯鼓录》《唐语林》《文子》《鬻子》等,都曾以阁本校过,但无论是正文中以夹注出校,还是未附校勘记,阁本所占的比重也都很小。然而,如换一个视角来看,此次校书活动,或许也为钱氏家族的丛书编刻确立了一个新思路,即不再一味迷信阁本,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其他版本和他校材料的搜求上。此外可能还促进了钱氏对张海鹏所刊《墨海金壶》态度的转变。在《墨海》卷前凡例中,张海鹏本来已经明言“诸书系文澜阁本居多”,钱、张等人不知是未见此凡例,还是对其说不以为然,第一次校书时仍要以之取校阁本。及至未能校出太多异文,才一面在《守山阁丛书》卷前识语中批评《墨海》“所采既驳,校讎未精”,并声称其书板已毁于火,一面又以其旧板印《守山阁》等丛书。这种对于《墨海》本的复杂态度,与文澜阁校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,复旦大学郑凌峰曾代为前往金山区图书馆探访《西泠纪游稿》下落,并抄录南京图书馆藏《古松楼剩稿》见示。台湾大学宫瑞龙曾代为查阅傅斯年图书馆藏《坤輿图说》。谨于此对二位友人的帮助深致谢意。

【作者简介】谢辉,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历史文献学。

^①李士娟:《〈四库全书〉撤出〈国史考异〉原因辨析》,《历史档案》2015年第2期,第131页。